

新文化史经典译丛
表象社会史

姜进 主编

催眠术

1778年2月

梅斯梅尔宣布自己发现了一种极细微的液体
在一切动物躯体中穿行、环绕

……人之所以得病

就是因为这种液体在人体内的流动
受到了“阻碍”

人可以通过“梅斯梅尔术”来控制 and 强化
这种液体的流动
最终恢复身体健康



[美] 罗伯特·达恩顿 著

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

新文化史经典译丛

表象社会史

姜进 主编

催眠术

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

[美] 罗伯特·达恩顿 著 周小进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美)达恩顿著;周小进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新文化史经典译丛)
ISBN 978-7-5617-7680-3

I. ①催… II. ①达…②周… III. ①文化史—研究—法国—近代②启蒙运动—研究—法国—近代 IV. ①K56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6989 号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

著 者 罗伯特·达恩顿
译 者 周小进
责任编辑 储德天
文字编辑 申 浩
责任校对 汤 定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rup.taobao.com/>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8.25
字 数 18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 4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7680-3/K·330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纪念我的父母
献给约翰

总序

还记得1990年代初,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正是后现代学术横扫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时,权力、建构、再现、认同、身份、性别、种族、酷儿(queer)等名词在前辈学者的著述和讲演中满天飞。研究生们很是兴奋,议论纷纷,都说这一轮后现代主义来势凶猛,但不知会不会也像此前一波又一波的学术新潮那样,转眼即逝。一位英国来的高才生此时淡淡地说了句话:“风暴过后的大海,难道还会是原来的大海吗?”他的意思很明白,可是这句话却有点儿费解。风暴过后的大海,恢复了平静,不还是原来的大海吗?不过,仔细想想,也可能已经不是了。谁知道呢?因为费解,所以就留下了记忆。不管大海的比喻是否恰当,事到如今,我们看到的经过后现代风暴洗礼的西方学术界的大海已经是“换了人间”。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真理、规律、客观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分析范畴成为批评的对象被重新审视,权力和建构等新概念当仁不让地入主学术界,全面刷新了学术研究的理论前提、路径、方法、目标和作用,导致了汤玛斯·库恩意义上的科学范式的革命,西方学术界进入后现代时期。

后现代运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初见端倪。法国思想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开创了文化研究的模式。他的名作《诊所的诞生》(1963)、《疯癫与文明》(1965)、《规训与惩罚》(1975)、《性史》(1976)等,对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王国发起了颠覆性的批判,揭示了对理性的顶礼膜拜是如何导致了对个性和差异性的敌视,理性又是如何运用强大的技术手段去控制、压制并企图消灭差异和不同,从而建立起井然有序的现代社会秩序的。福柯的批判可谓石破天惊,打破了现代理性主义作为人性解放运动的神话,使人们看到了以理性之名对个性和人性自由发展的种种干预:从个



人的性取向到如何思想、如何做事、如何生活都必需依从理性的规训，因为理性本身代表着某种类似被其推翻的上帝的最高原则。福柯的著作描述了理性王国的建立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历史的终极。现代理性主义是一种话语，一种意识形态，并非如其宣称的绝对真理。理性是一个思想和言说的武器，是某些人手中的权力利器，另一些人的克星。福柯对现代理性运动的描述和反思使理性时代从绝对真理的神坛上走了下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后理性时代宣告来临，后现代也从此粉墨登场。西方社会中的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等边缘和弱势人群在学术界的代言人接过文化批判的武器，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等及其理论根源，大众文化研究、同性恋及性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学术和族群理论成为弱势争取社会公民合法身份的武器，成为后现代学术的重镇。后现代理论又反过来为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特殊人群对保持和追求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西方社会中的个人自由从而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后现代亦成为一个社会现象。

西方学术界的后现代之风中也有其来自东方之源。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早已纠缠在一起，互相影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后现代之风，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界、跨文化的东、西方左翼学者共同推动形成的，而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其中最为强劲的一支力量。出身于巴勒斯坦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于1978年首创东方主义理论。萨伊德在哥大的来自加尔各答的同事嘎娅特利·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于1988年首创了下属群体研究，并正式提出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印度学者吉安·普拉卡什(Gyan Prakash)等的大力倡导下，后殖民主义理论强势登场，成为后现代学术中的正义之师，从女性、下层民众、殖民地人民等边缘人群的角度，对西方中心的现代启蒙主义思想体系及其全球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揭示出在这一理性秩序之下所隐藏着的东、西方不对等的权力结构。

后现代学术在史学界是以新文化史的样式来表达自己的。早在1960年



总序

代中到 1980 年代初,新文化史一批最早的经典就已陆续问世,包括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的《夜间的战斗:16、17 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1966,又名《丰收巫师》)和《奶酪与虫:一个 17 世纪磨坊主的世界》(1976 年)、埃曼纽·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1975 年)和娜塔莉·戴维斯(Natalia Davis)的《马丹·盖赫返乡记》(1983 年)等。这批著作极大地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在试图摆脱传统史学的精英主义的同时也扬弃了当时盛行的社会史、经济史的计量方法,而比福柯的历史更远离精英世界及其普世原则。这些著作所注重的是生活于此时此地特殊环境之中的人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将研究聚焦于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世界,用叙事史学的方式细细描述,将读者带入了一个个不同的微观世界,使历史这一古老的学科变得愈发迷人、有趣、生动,昭示了历史原来是可以如此书写的。1980-1990 年代是新文化史迅速扩张发展的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新的经典,一方面用文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刷新了传统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等领域,同时更开拓出史学研究的诸多新领域,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史运动。除了上述微观史的一些代表著作外,著名的政治文化史著作有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林·亨特(Lynn Hunt)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1984)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1993)、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制作路易十四》(1992)、以及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的《启蒙运动中的法国》(1993);社会文化史方面有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与社会》(1972)、杰克·古迪(Jack Goody)的《欧洲家庭和婚姻的演变》(1983)、以及娜塔莉·戴维斯的《边缘上的女人:17 世纪的三个故事》(1995);物质文化史方面的领军人物是杰克·古迪,著有《烹饪、菜肴和阶级:比较社会学研究》(1982)和《花的文化》(1993),和丹尼尔·罗什,著有《服装的文化:‘古王朝’的装束与时尚》(1989)和《日常物品的历史:消费文化在法国的诞生 1600-1800》(1997);感性文化史方面有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1968)、阿



兰·柯尔本(Alain Corbin)的《傻子与香味:嗅觉与法国社会想象》(1982)和《时间、欲望和恐怖》(1991);身体性态史方面有林·亨特主编的《艳欲与身体政治》(1991)和《色情的发明:淫秽与现代性的起源 1500 - 1800》(1993)、朱蒂斯·克维奇(Judith Walkowitz)的《恐怖乐趣的城市:维多利亚晚期伦敦的性危险的叙事》(1992);罗伯特·达恩顿是媒体与传播史中研究印刷和阅读文化的领军人物,著有《启蒙运动的生意》(1979)、《大革命前法国被禁的畅销书》(1995)、与丹尼尔·罗什合作著有《印刷中的革命:法国的出版业 1775 - 1800》(1989)、与彼德·伯克合作著有《媒体的社会史:从谷登博歌到互联网》(2001)等。这批著作深受福柯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以及文化研究、符号学的影响,以文化体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模式,代之以存在与意识互动、更强调文化对社会关系的型塑作用,颠覆了盛行一时的社会史模式。在此背景下,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于1989年问世,明确打出了新文化史的大旗,确定了历史学主流之“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的事实。

我在斯坦福大学求学之时,正是新文化史风起云涌之际。当年阅读上述那些史学新作时所感受到的巨大的精神和智力上的冲击和挑战,与同学老师讨论时的兴奋和激动,记忆犹新。如今,新文化史已经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不再新鲜,甚至已经成为反思的对象。林·亨特本人和她的同事们就在打出大旗的十年后,出版了《超越文化转向》(1999)一书,对文化转向后的史学理论和多元化史学实践中的问题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作了一次审视和检讨。史学界对文化转向的怀疑之声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不过,无论是来自新文化史内部的反省,还是来自史学界其他部分的质疑,似乎都在不断地被新文化史所消化和吸收,使文化转向的基本理论主张和研究方法更富有涵盖性和普遍性,不仅吞并了传统思想文化史领域,更渗透到传统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领域里,使基于文化转向的史学模式进一步扩大其应用范围,当仁不让地稳坐史学主流的第一把交椅。

史学的文化转向并非是对此前社会史主流的简单修正,也并不仅仅是研



究重点的转移,而是后现代理论对从十九世纪的兰克学派到二战后兴起的社会史将历史学科学化的现代主义史学潮流的一次清算。新文化史的叙事史也不是对古典叙事史学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有着一组十分不同的理论假设和叙事策略的史学新范式。这一新范式的特点是对前科学时代叙事史的重新发现,对史学的文学性的重新肯定,其最感兴趣的是语言建构和改变社会政治生活的机制和过程。如果说现代主义史学是以寻找和掌握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以此种“客观真理”来解释和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那么新文化史则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多元的、充满偶然性的开放体系,而史学的功用就是去探寻和解读社会所赖以运行的语言和技术系统,如此而产生的史学知识本身就会形成对社会政治的干预,成为改造社会政治的一种力量。我们可以通过其中一些关键概念对史学的文化转向做一个粗陋的描述。

文化转向有时也称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其知识论的来源是语言学中的符号学。在后现代的批判中,语言符号与其所指之事物之间并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符号在使用过程中会脱离原来所指之事物而成为某种意义的象征。语言所构成的意义世界绝非其所处客观世界的镜像,反而是形塑人们感知客观世界的滤镜。简而言之,存在并不一定决定意识,而意识反过来却一定有塑造存在的功效。这就打破了形形色色的决定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或年鉴学派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只有人类才拥有的语言及其抽象能力被看作塑造人类生存状态的特殊重要的力量,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史学研究也从调查人类社会的客观状态转而探寻文化体系是如何塑造和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也就是说语言是如何通过知识的生产去形塑和改变社会、政治、经济的权力结构的。既然存在和意识之间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简单的因果关系、线性的历史发展观、以及作为社会科学的史学对统一性、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强调在新文化史中被宣告出局。地点、时间、人群组合的特殊性、差异性、偶然性、多元性成了常态,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解读(reading)也就代替了对前因后果的解释(explaining)。新文化史注重于细致描述具体人群的具体生活,并不刻意把自己的描述对象当作某种统一性的典型代

表,反而对其特殊性更觉兴味盎然。达恩顿说的好:“历史学家们表面上是在一些大家不感兴趣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实际上他们是在帮我们跟古人沟通。想想人类有多少人已经消失在过去,他们在人数上远比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后代为多。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通过个别事件挖掘出前人的生体验验和当时的生存状况。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称: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这是我的偏好)。不管用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对“生活的意义”这样的伟大哲学命题,要想找到它的终极答案是徒劳的。但我们不妨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求和了解前人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①

无论是貌似平静的日常生活,还是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新文化史研究的焦点都是当时当地参与其中的人群对自己的生活和周围世界的体验和理解,她/他们的生存策略以及表达自己诉求的特殊方式,相信生活在过去的男男女女正是以自己特殊的生存策略和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开辟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无限可能性。相对于将重大历史事件放在某一目的论体系中去寻求因果解释的现代史学来说,新文化史感兴趣的是事件的具体过程,要根据事件过程中发生的新的话语和社会实践来认识其特殊意义。以法国大革命史为例,现代史学所关注的是大革命的原因及其后果,由此而形成的大革命的前因后果又会向前后两个方向延伸,形成一条线形的因果链。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将大革命解释成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演进中的一环,还是现代主义学派将大革命看作从中世纪政治走向现代国家的转折点,其关注的重点都越来越远离大革命本身而转到大革命之前和之后的比较。在新文化史看来,这种目的论史学为了解释大革命的因果关系而牺牲了对大革命过程的具体考察,忽视和过滤掉了许多不能被特定因果链所容纳的重要现象。林·亨特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一书中对大革命过程中的政治表达模

^① Robert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s: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0, p. 4. 转引自本书萧知纬译,罗伯特·达恩顿著《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导论》。



式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和分析后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成就在于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发明了意识形态。她在导言中指出,“法国大革命让时人感到震惊,并不是因为它为资本主义发展或政治现代化打下了什么基础。英国人找到了更多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效途径,普鲁士人则证实了一个国家可以没有民主,没有革命,但同样可以实现政治现代化。而法国大革命对于经济增长或政治稳定几乎没起什么作用。但是,它的确开发了民主共和主义在民众动员方面的潜力,并且营造了革命变迁中催人奋进的紧张气氛。民族复兴的语言、平等博爱的姿态、共和主义的仪式都不会被轻易遗忘,民主、恐怖、雅各宾主义和警察国家在政治生活中也一再出现。”^①

如果说新文化史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目标的话,那也许就是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调查去研究话语、仪式、再现(representation)中权力运作的机制、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以及所达到的成效,从而揭示权力是如何通过控制知识的生产来展开博弈的。有意思的是,这些权力运作的策略是中性的,压迫者以此来达到控制、统治和压制他人的目的,被压迫的人们也会以此来进行反击,压迫与反压迫之间的斗争就围绕着知识的生产 and 运用而不断地进行。对于新文化史来说,一切经济、社会、文化都是政治的,充满了权力的博弈的。新文化史就是要在世人面前展示权力运作的真相,同时指出人们又是如何反抗压迫的;其对权力运作机制的深刻解析和批判,及其反对压迫和控制的政治、道德倾向贯穿始终,可以说是新文化史的灵魂。更重要的是,后现代对于压迫和控制的批判、新文化史对个体性、具体性、特殊性的强调都是建立在个人权利(human rights)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具有普适性的价值预设之上的,其反对的不仅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或者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压迫,而是一切形式的对任何个体天赋人权的剥夺和压制。在这方面,新文化史秉承了马克思以人性解放为标的的政治理想。

^①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15. 转引自本丛书汪珍珠译,林·亨特著《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导论》。

新文化史的理论和实践给古老的历史学科带来了新气象。后现代对现代主义建立在目的论基础上的宏大叙事的批评加速了百科全书/通史类史学模式的式微,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批判史学开辟了道路。以问题为中心的史学必然是自主的,多元的,大众的。因为每一位史学家都会有自己的身份认同,都会对某些个人和社会群体所遭到的压迫持批判态度,从而产生自己迫切想要调查研究的问题,并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干预和改造现状。以问题为中心的史学又必然是跨学科的,因为史学家需要动用所有可资利用的资源和方法对自己的课题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读。新文化史文化批判的理论和方法渗透到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在此影响下,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使这些领域的传统研究对象都和文化政治搅和在了一起。政治史不再只是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变成了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传统经济学因为文化因素的介入而演变成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史也不再满足于描述下层人民生活的客观状况,而是要了解文化体系是如何塑造了民众的身份认同、情感和日常生活的。传统思想文化史更是被新文化史彻底颠覆。在这里,主要的任务不再是如何正确理解大师们的思想,而是要探究思想、仪式、知识、风格作为话语是如何产生的,某些话语是如何取得霸权地位的,其作用于社会的功效如何,等等。史学研究的领域从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对日常生活和重大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覆盖。史料的范围也空前扩展,从仪式、个人的口述史、小报、民间传说、戏剧、小说、绘画、流行歌曲到服饰,都可以成为史料。就研究专题来说,也是应有尽有,从福柯对疯癫、性文化、监狱、诊所等的研究,到达恩顿的《屠猫记》,凯斯·汤玛斯(Keith Thomas)的《宗教与巫术的兴衰:16-17世纪英格兰的大众信仰研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都为读者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日常生活场景中一个个全景式的片断,使读者在了解过去民众的生活的同时能够反观自己的世界,而不只是充当帝王将相历史的无关紧要的旁观者。

汉文世界介绍新文化史的工作近年来做了不少。其中台湾对新文化史的推介工作要比大陆的更为积极,出版的译著也较大陆为多。大陆学者也间



或有翻译出版福柯及有关新文化史经典专著的。而留学欧美的汉文学者是译介新文化史及其他有关西方经典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这十数年中,陆陆续续出版的有关译著不下几十种,但大多是各自为战,零零散散,未能形成体系。其中不乏精品译作,但滥竽充数的也不在少数。这些译著对汉文人文社科学术界的影响各有优劣,好的译著影响深远,劣质的译著往往令读者茫然不知所云,更要受误译误导之苦。有鉴于此,我们希望能够出版一套丛书,在已有译著的基础上,再系统地翻译出版海外新文化史的一系列经典著作,向汉文世界集中而较为全面地介绍这一重要的学术运动。在我们精选的著作中,有林·亨特主编、影响巨大的论文集《新文化史》和罗伯特·达恩顿讨论方法论的《拉摩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这样的理论经典,提纲挈领地给出了新文化史的开端、发展、及其基本理论假设、方法论、研究策略、及其所关心的一些课题的概况。也有如林·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及罗伯特·达恩顿的《催眠术与启蒙运动在法国的终结》和《革命前法国被禁的畅销书》等重写法国大革命史的经典之作。海外新文化史的成果丰富,覆盖面极广,而且多为跨学科的研究,很难有明确的分类。为了读者的方便,这套丛书仍将所选经典大致分出一些专题,陆续翻译出版。这些专题包括理论经典,微观史,政治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感性文化史,身体性态史,物质文化史,媒体与传播史等。

近年来,多次给历史系和中文、社会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生开设新文化史的阅读课,深感年轻学子对了解海外新学术之渴望,亦深感高质量译著之至关重要,却往往叹其可遇而不可求。翻译学术著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的译者均任教于海内外不同高校,都是凭着对学术的热爱和为学界服务之心,自告奋勇,接下艰苦的翻译任务,辛勤耕耘,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读者奉献一批合格的、出色的译著,对新文化史这一重要的学术运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推介工作。

在此丛书即将面世之际,我们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本丛书的策划储德天编辑,她对学术的热爱、她的学术眼光和她

作为编辑的专业精神,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学生们,是她/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和课堂上的热烈讨论,使我相信这是件值得做的事情,才下决心和储编一起来做这套丛书。谨以此丛书献给我们的学生—中国学术的未来。

姜进

2010年3月8日

写于海上凤凰城

引言

这本小书有个大目标：旨在考察大革命前受过教育的法国人的心态，看看他们的世界在被大革命颠覆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如此宏大自负的目标注定要失败，因为谁能指望窥见近两个世纪前的人的内心呢？但是这个目标值得一试。如果利用当时人们心态的一些被人忽略的线索，也许能达到一定的准确性。这些线索零零散散地存于各种文献之中，包括当时的科学期刊和宣传手册、曾在街头叫卖的流行歌曲和漫画的片段、以及可能曾经散落在 18 世纪客厅和咖啡厅中的那些出版物上的致编辑信和付费广告，最后还有在各馆藏手稿中得以保存的私人信件、日记、警方报告和俱乐部会议记录。这些材料至少能给人留下关于 18 世纪 80 年代公众阅读兴趣的强烈印象。而他们的兴趣则能提供一些与当时激进主义的性质有关的令人惊讶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出各种激进观点如何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专论中渗透下来，在最底层的识字公众中传播。

了解所有感兴趣的话题是不可能的，甚至在留下相关记录的精英分子之中也是如此。所以我把研究范围限制在如今看来似乎是当时最流行的话题上——宽泛地说是科学，具体说是催眠术。如果读者觉得关注这个话题太奇怪、太招摇了而避之唯恐不及，那么他至少可以欣赏他自己和 18 世纪 80 年代法国人之间的时间差距。那些法国人认为催眠术是一种严肃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自然、自然中那些看不见的神奇力量；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解释主导社会和政治的力量。他们如此彻底地吸收了催眠术,以至于在他们遗留给儿孙辈的那些态度和立场中,催眠术成了一个重要部分,与其他因素一起造就了我们现在所谓的浪漫主义。催眠术在这笔遗产中的地位从未得到认可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后来的几代人对于他们自己世界观中那不纯洁的、伪科学的源头更加反感,也就想方设法要忘记梅斯梅尔(Mesmer)在“旧制度”最后几年中的显赫地位。本研究将恢复梅斯梅尔应有的地位。在那个年代最受关注的人物的殿堂中,他的位置应该与杜尔哥(Turgot)、富兰克林(Franklin)和卡廖斯特罗(Cagliostro)等人相仿。这样做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启蒙运动的法则是如何被重塑为革命宣传物,后来又是如何被转变为19世纪信仰的构成要素的。因此,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启蒙运动是如何终结的——不是绝对的终结(因为一些人仍旧严肃地对待《独立宣言》和《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而是历史的终结、作为18世纪一个标志性运动的终结;这也许只能帮助读者品尝一下遥远过去的味道。但如果最后这个更加保守的目标能够达到,那么这也就值得读者关注了。因为这样的品尝过程,正是历史研究的乐趣所在。

我自己从历史研究中获得很多乐趣要归功于牛津大学的哈利·皮特(Harry Pitt)和罗伯特·沙克尔顿(Robert Shackleton)。我感谢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支持过我的人——罗德基金会(the Rhodes Trust)各理事、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院长和同事们,以及哈佛大学学者协会(Society of Fellows of Harvard University)。感谢在本书写作不同阶段阅读过手稿的那些人,——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约翰·普拉梅纳茨(John Plamenatz)、菲利普·威廉斯(Philip Wil-



liams)、克莱恩·布林顿(Crane Brinton)、约翰逊·比彻(Jonathan Beecher)、约翰·霍奇(John Hodge)。贝尔加斯·杜·帕蒂-图阿尔(Bergasse du Petit-Thouars)家族的热情,肯定会让他们的祖先——最初的法裔美国人——感到欣喜,他们不仅允诺我使用他们的文稿,还让我使用存放文稿的城堡。

为了避免每页脚注过多而显得杂乱,我将注释集中为较长的脚注,ix 其中的文献来源按照引文出现的顺序依次排列。一些过于冗长的 18 世纪文献标题则予以缩减,后面加上省略号。所引文献出版的时间地点均依照文献标题页上的时间地点。有些文献上的相关信息显然是虚构的,比如“费城”或“月球”,但也都予以保留。如果作者姓名或出版物的时间地点没有给出,说明原来作品中就没有相关信息。除文献标题外,拼写和标点都进行了调整,以符合现代习惯。翻译是我自己做的,我倾向于把“magnétisme animal”(动物磁力学,在 18 世纪常常缩写为“magnétisme”)译为“mesmerism”(催眠术),尽管有位现代专家说“mesmérisme”最早的使用是在 19 世纪初期。^① 实际上,18 世纪 80 年代的法国人是把这个词和“magnétisme animal”当作同义词来用的。

罗伯特·达恩顿

1968 年 4 月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① 克利克斯坦(H. S. Klickstein)对伯恩哈德·米尔特(Bernhard Milt)的《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与瑞士的关系》(*Franz Anton Mesmer und seine Beziehungen zur Schweiz*)一书的评论,载于《医史通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XXIX (1955), 第 187 页。